

# 從中共黨代表大會報告

## 看中共與美國關係

趙 建 民

### 前 言

國內一般有關美國與中共關係的著作，通常有幾個缺點：一是純從外交的角度着手，因而忽略了內政因素的重要性；二是從美國方面探討問題，蒐集資料，分析人事，探究某一事件的發展過程，較少以中共資料出發，因而忽略了中共因素；三是通常以分析現勢為主，因此，論著易流於片斷與局部性。一言以蔽之，就是或不免以偏概全，未能完全掌握問題的核

心。

用以彌補上述缺點途徑之一，是輔以中共官方文件分析法。此一研究途徑的特點，是確立內政之於外交的重要性（外交本為內政之延長，各個國家皆然，共產極權政體尤其如此），因此，在談中共外交之前，必先對支持中共政權之「上層建築」（意識形態、政治制度、派系爭執、領導更迭等）和「下層建築」之經濟結構及政策有所瞭解，筆者將之稱為總體政策取向（macro-policy approach）。有關前項建築之其他內容諸如法律、宗教等，

似乎只能算是低度政治（low politics）中之低度政治（根據時下的分法，整個「上層建築」各內容均非「高度政治」（high politics），而宗教和法律在中國大陸迄今尚居從屬地位），無暇多所顧及。如此可以免除見樹（外交政策）而不見林（政治機體）的可能偏差。

採取此一研究途徑的第二特點，是把單純的美國與中共關係之討論，納入中共總體外交體系，筆者將之稱為總體外交政策取向（macro-foreign policy approach），使得中共外交政策的全面性得以彌補雙邊關係分析上的片面性。正當中共強調「全方位外交」之際，此一特點具有格外意義。

雖然文件分析法有其研究上的完整性，足以提供研究者與閱讀者垂直式的縱深架構，但以官方文件作為分析對象，有時難以完全免除官方政策的宣導性，無法達到令人滿意的客觀標準。此一顧慮適用於中共案例尤然。

### 劉少奇「八大」報告對美威脅利誘

一九五〇年代中共政權新成立，採取了反美親蘇的路線，美國也與中華民國簽訂了「共同防禦條約」。一九五六年劉少奇在「八大」上的政治報告，其中有關美國的描繪，大抵可以分為下列幾方面：

第一，認為美國在面對二次世界戰後共產主義勢力的擴張和各殖民地紛紛要求獨立的民族主義運動，乃利用其於二次大戰中所獲得的有利地位，進行「瘋狂的擴張活動」。報告批評美國社會中有「依靠侵略發財、依靠殖民地和外國市場發財的階級」存在，因美國與西歐、日、韓、中等雙邊或多邊軍事協定等都被視為是擴張軍備、樹立霸權、「害怕和平共存好像害怕世界末日一樣。」

第二，國際情勢基本上是好的。由於美國軍事結盟有其選擇性，中共認為這是越來越多國家認識到美國「帝國主義是當前最大、最貪婪的殖民主義者」，因而選擇不參加美國的「侵略性軍事集團」，改採「和平中立政策。」

美國主要西歐盟邦的英國和法國，被認為是受到沈重國際軍費負擔，無力發展經濟，因

而產生的對美不滿情緒。雖然中共一直到六〇年代才提出「中間地帶」理論，直到七〇年代中葉才有「三個世界論」的出現，在一九五六年時，英法似乎已經被分在所謂的「第二世界」的範圍內了。其特性一如中共內部的「民族階級鬥爭」，具有反覆而矛盾的兩面性。因此，中共估量英法雖也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和平共處的願望」，但仍然不願意放棄以武力作為保持殖民主義特權的政策（此明顯地指英法出兵蘇彝士運河而言）。

第三，對美政策原則，雖然先已列舉了各種「美帝罪行」，仍然不吝強調容易討好的「和平共處」原則，聲言將透過和平協商的辦法以解決與美國的爭端，重申中共在雙方日內瓦「大使級」會談中於一九五五年九月舉行的第五回合談判中，所提出昇高談判代表為外交部長的建議，假「消除台灣地區緊張局勢」美名，達到宣揚形象的目的。

第四，最後，劉少奇的報告在「利誘」（和平共處）之餘，不忘「脅迫」一番，強調假如美國再不改變它這種「不現實的和不合理的」政策，那麼受到圍堵孤立的，並不是中共，而「恰恰是美帝國主義」。因此，假如美國不想繼續失敗下去，就最好儘快改變這種不合理的政策。

### 林彪「九大」報告斥美帝是紙老虎

六〇年代歷經浩劫，林彪在一九六九年「九大」上所作之政治報告最引人注意的是，林

彪提出當前世界存在所謂的「四大矛盾」問題，亦即被壓迫民族同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的矛盾；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國家內部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帝國主義國家同社會帝國主義之間、帝國主義各國之間的矛盾；社會主義國家同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從這個邏輯推理，林彪對當時天下形式之評估約略為：

(一)由於各被壓迫民族的抗爭，以及帝國主義內部與彼此之爭鋒，加上美、蘇之鬥爭，使得「革命情勢大好」，乃至於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各國人民的革命運動蓬勃高漲」。當然，所謂的「革命」，指的是毛澤東式的武裝鬥爭，因此，毛某的「「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真理日益為廣大被壓迫人民之被壓迫民族所掌握。」

面對此一情勢，中國共產黨和人民堅決保證：「一定要履行自己的無產階級國際義務（按：指國際革命），同他們一道，把反對帝國主義、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反對各國反動派的偉大鬥爭，進行到底。」

(二)正因為上述鬥爭，「美帝國主義」和「蘇修社會帝國主義」陷於內外交困的政經危機，因此同為「紙老虎」。美、蘇之間，林彪報告說明，是一種相互敵對、相互鬥爭，但又要相互勾結以瓜分世界之矛盾關係。

(三)至於美國，既是一個紙老虎，因此內部是「千瘡百孔」、處處危機，外部則帝國面臨崩潰，指揮不靈等困境，因此大量增加軍費、

製造飛機、大砲、核子彈，霸佔台灣，這一切都是用來「嚇唬人民、鎮壓人民、屠殺人民、霸佔世界的。」因此終將與全世界人民為敵，陷入「全世界廣大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的包圍和痛擊之中。」

### 周恩來「十大」報告 對美態度轉趨溫和

一九七三年八月召開的中共第十次黨代表大會，乃是在中共內部重大變故（林彪事件）需要休養生息（歷經文革之浩劫）之際，外部却是老友（蘇聯）反目、新友（美國）遙不可及之尷尬情況下召開的。

周恩來所作的政治報告有幾個特點：(一)出奇之短；(二)宣傳、教條意味十足，引用馬、恩、毛言論極多；(三)沒有實質政策報告，和九大林彪之報告氣味相投。

報告中除了猛烈批判林彪是「資產階級野心家、陽謀家、兩面派」以外，對「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攻擊更是不遺餘力，相形之下，對美國的態度可就溫和多了。就批林部份，報告中引用了毛澤東的名言：「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陽謀詭計。」

關於國際形勢的評估，周恩來的報告和四年前林彪的報告也極為相似，整個世界是處於「天下大亂、形勢大好」的情勢。所謂「大亂」，是指第三世界國家革命方興未艾，因此可以說是「大好」。

有關美國部份，大都含括於其對美蘇的共

同批評上頭，美、蘇仍然是鬥爭以圖霸權，同時又互相勾結以分天下，但是「爭奪是絕對的、長期的」，「勾結是相對的、短暫的。」

### 華國鋒「十一大」報告 增加強關係條件

一九七七年八月間召開的中共黨第十一屆代表大會，不論在權力基礎、社會型態各方面，均處於明顯的過渡與適應階段。華國鋒的「政治報告」集中表現出兩個特點：一是極度的毛澤東色彩，以求為其本身權力來源之合法化；二是批「四人幫」，以為他所導演的這一場「宮廷政變」辯白。這也是中共黨史上毛澤東最後一次以正面的形象出現主宰黨大會。

基本上，華國鋒對於國際形勢的看法大體維持不變，亦即國際形勢仍然是「大好，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革命繼續向前發展。而美、蘇仍然是問題重重，內外交困，都是「紙老虎」。

第二，報告中對美蘇有了明顯差別待遇。雖然美蘇仍是「新的世界大戰的策源地」，但是華國鋒強調蘇聯「帝國主義」（不再是修正主義）採取攻勢，因此更為危險；美國「帝國主義」則採守勢，危險性較低。但同為「霸權主義」則無異。

第三，報告中直接提及美國的地方篇幅很少，就是在與蘇聯相提並論之時，也把重點集中在對蘇聯的攻擊。單獨牽涉美國的部份，只有強調兩者「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不同，存在根本的分歧。」同時，華國鋒也提出了如何加

強關係的條件，亦即若要關係「正常化」，華府必須(1)斷絕與中華民國外交關係；(2)撤退美國在台灣和台灣海峽地區的一切武裝力量 and 軍事設施；(3)廢除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易言之，當時中共已經相當程度地將其與美國關係發展的阻礙限制在所謂的「台灣問題」上了。

### 胡耀邦在「十二大」為美國

#### 除「帝國主義」稱號

自中國共產黨成立（一九二一年）以來，第一次正式承認美國的合法地位存在的第十二次黨代表大會，於一九八二年的九月召開，在此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聚會中，美國扮演何種角色勿寧是極其有趣又為有心人士所極想獲得答案的。

、胡耀邦的報告果然顯示了自中共政權成立以來截然不同的風味，堪稱一個新的外交時代的來臨。

首先，在稱呼上，美國一詞之下不再冠以沿用六十年的「帝國主義」；蘇聯一詞之后也不再引用使用廿餘年的「社會帝國主義」或者「修正主義」稱號。

其次，一反過去尖銳的與美蘇敵對，不惜與之一戰的反動心態，胡耀邦提出「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強調「決不依附于任何大國或者國家集團，決不屈服于任何大國的壓力」。似乎在心態上和認知上，中共終於承認技不如人，因此不再能夠強力對抗，而要改以不願屈服了。

第三，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和殖民主義仍然是威脅世界和平的主要力量，然而霸權明白指的是蘇聯，美國雖沒有被公開指為霸權主義，但在語氣之間也包括在內。亦即美蘇是世界和平的共同威脅，一改前回蘇聯威脅較大的說法。

第四，有單獨描述美國的部份則和一九七七年華國鋒報告相類似，強調繼續出售武器給台灣，是把「台灣作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對待」，這是「侵犯中國主權，干涉中國內政的行為。」唯二不同點，在於胡耀邦承認一九七九年雙方關係的建立，是「符合兩國人民利益的關係。」

趙紫陽在一九八七年十月廿五日中共「十三大」上的政治報告之最大特色，在於並無專章敘述當前中共對外策略部份，此為異於中共政權成立以來前五次黨代表大會之處。報告只略略地提出了原則性文字，說明根據國際形勢和內部現代化的需要，調整對外關係，以和平與發展為中心，發展出來了「獨立自由、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對外政策。」

倒是李鵬在今年三月廿五日在中共「七屆人大」上所作「政府工作報告」中有相當外交篇幅，本文開頭也有簡單介紹。

李鵬報告不再引用「美帝」、「蘇修」或「社會帝國主義」字眼，相當程度的表現了當前中共務實的外交作風，突破早先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一方面強調「不依附於任何大國，也不同它們結盟或建立戰略關係」的所謂「獨

立自主」原則，同時說明影響中（共）美關係的是「台灣問題」和其他「種種借口干涉中國的內政」；而阻撓中蘇關係進展的則是「三大障礙」，再度表現出其着重實際問題的心態。

## 中共「十三大」後的新外交政策

綜合的說，中共「十三大」後所代表的外交路線概略如下：

(一)中共新外交政策雖然在「十二大」雛形初具，但至「十三大」時已因應國際形勢而有了不同的評估。「七屆人大」後新舊「外交部長」吳學謙和錢其琛共同出席了一項記者會，提出了所謂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增加「和平」兩字（事實上此名詞已出現在「十三大」趙紫陽報告中），認為中國大陸固然需要和平的環境以利建設，整個國際大環境而言，也是和平因素大於戰爭因素。因此，可以肯定指出，中共十三大所揭櫫的外交路線有了結構性的改變。

(二)中共並未放棄「反霸主義」，事實上，假如中共想要繼續堅持「獨立自主」的，與美蘇維持「等距離」的外交路線，反霸便不會消失。雖然熊玠教授從李鵬「七屆人大」的報告出發，認為中共不再提出反霸文字，但吳、錢在記者會上却明白的重申了此一原則。

(三)近年來中共強調經濟開放政策，試圖引進西方先進技術和資金，先從事「沿海發展策略」，進而帶動內陸之次第開展，因此外交重

點似乎集中於西方先進國家和日本，表面上看來，中共過去引以自豪的結交「小朋友、黑朋友、窮朋友」的情況不復存在。但是正如鄧小平強調的「中國式社會主義」當前只是一個「初級階段」，因此具有過渡性質，而幫助完成此一「初級階段」任務之資本主義工具，自然也屬於過渡時期的「必需的惡」了。

因此，「第三世界」這片廣大園地，中共必不會放棄。李鵬報告重提七〇年代甚囂塵上的「國際經濟新秩序」(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支持第三世界國家改變世界貿易、金融等現行秩序的要求，和重新界定技術轉讓等問題。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所長普契拉(Donald J. Puchala)，以其聯合國經驗，也發表意見支持筆者看法。

(四)近年來中共有逐漸減少其自一九七九年以來所給予美、日兩國極大外交份量的趨勢，轉而予東、西歐、亞洲地區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較多注意，此舉有人認為是中共對外關係逐漸成熟的表現，也是中共尋求較「平衡」之外交關係之具體事實。以其自身術語而言，是「全方位」外交。

## 結 論

經過過去四十年來中共經歷的六個黨代表大會和今年的「人民代表大會」的官方文件，吾人可以清晰地審視中共外交取向之變革以及美國在中共官方中之地位。此一文件分析法，

無疑可以提供吾人作為瞭解美中（共）關係的重要基礎。

讀完了這些文件，吾人也清楚目睹了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外交史上轉變最為劇烈，也最為戲劇化的國際間遊戲規則，這個心路歷程所帶給中國大陸人民不論在思想上、認識上以及調適上的衝擊，無疑是難以比擬的。

美國在中共官方地位由一個不共戴天的死敵逐漸演變為一正常外交伙伴，受到中共官方承認，此一事實，除了反應國際政治中敵友組合與認定變易不定與冷曖無常之千古真理以外，更隱含了共產黨式辯證法的邏輯。畢竟，社會主義理想的實現，仍然是今天中共領導人所共同遵循的不變真理。

在這種雙重邏輯的涵蓋之下，未來美國在中共官方認知圖上的形象為何？會有怎樣的改變？短期而言，在可預見的未來，當前這種在衝突中尋求共識，在合作中不免紛歧的現階段互動情勢似可維持。長期而言，牽涉的變數就十分繁複了，舉其大者：中共改革成敗；社會主義轉變方向與幅度；中共社會開放於國際環境之程度；中蘇關係，美國未來在國際舞台之角色與地位；其他相關國家如日本、西歐、東南亞、中華民國之於中共影響程度等等。恐怕只有屆時方能分曉了。

